

# 翻译教师和普通读者在译文在线评阅中的认知过程研究\*

——基于眼动追踪数据的翻译质量评测

马星城<sup>1</sup> 李德超<sup>2</sup>

(1.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1100;2.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中国香港)

**摘要:**读者在翻译作品评阅中的认知行为往往为翻译过程研究所忽视:读者主体性将如何影响其在线加工模式,译作评阅过程和译作质量评估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等问题还需实证数据的检验。本研究以读者在翻译作品评阅中的认知过程为研究对象,运用眼动追踪技术,记录并比较职业翻译教师和普通读者在评阅不同类型英译汉翻译文本时的认知负荷和注意力分配状况,并结合读后评测和访谈,以期揭示不同专业背景的读者在评阅翻译产品中的思维过程以及其对翻译质量的解读。结果显示,普通读者在评阅中的认知负荷普遍小于教师组,对译作的细读程度不及教师,更倾向于有重点的跳跃式阅读。他们对译作的评分普遍高于教师组,并且对译文大多持积极态度,在对译作的语言形式上展现出不同于翻译教师的期待规范。

**关键词:**翻译质量;主体性;普通读者;认知过程;眼动追踪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242(2020)04-0028-09

**DOI:**10.13978/j.cnki.wyj.2020.04.005

## 0. 引言

质量是翻译研究中的重要概念,翻译质量直接影响着译文在目标语体系中的可接受程度(Paulina & Pollastri 2008; Schäffner 1998)。评测翻译质量需建立一套明确、客观并行之有效的标准,但翻译质量是一个相对概念,受到翻译目的、翻译活动参与者和目标语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制约(Colina 2008)。有学者指出,翻译质量评测是翻译研究中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之一(Colina 2008; Hansen 2009),也是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的领域(Hatim & Mason 1997)。

在翻译研究中,对翻译质量的评测多以理论为出发点(House 1997)。理论立场不同,对翻译质量的理解和评测手段也不同(House 2015: 52)。Lauscher(2000)将主流的翻译质量评测模式分为两类:一类是原文-译文对等的评测路径,侧重对文本特征的对照和分析(Reiß 1971; House 1997, 2014);另一类为功能路径(如 D'Hulst 1997; Nord 1993),主要考察译文是否在目标语文化中发挥其预期的功效或目的。基于原文-译文对等关系的评测脱离不了对文本特征的详细考察,统计和归类翻译错误因此成为教学中的主要质量评测手段(Orlando 2011)。

## 1. 翻译质量评测中的读者因素和眼动追踪

### 1.1 翻译质量评测中的读者因素

翻译质量是一个多维度的动态概念,兼具主体性、

内隐性、社会性和发展性(武光军 2007)。从主体性角度看,评测翻译质量就是评价主体依循特定的标准或价值取向对客体质量进行判断的过程。Reiss(2004: 114)认为不应忽视主体因素对翻译质量评价的影响。

考察普通读者对翻译质量的理解和评判有望为翻译质量评估提供全新视角。这里“普通读者”指的是现实中翻译的真实受众。Rosa(2006)提出,可将目标语读者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读者,另一类是理想的或假想的读者。后者具备较高的阅读和思考能力,能够领会原作的深刻意义;他们也是假设或期待中的目标读者群,是原文作者的信息传达对象(Fish 1970)。然而,目前的翻译质量研究的重点仍然是文本或译者,甚少讨论普通读者的需求,亦没有考察读者在评阅翻译中的具体行为。

教学体系中的质量评价主体往往比较单一化:教师在翻译质量评测中占主导地位,依据相似的标准评价学生译作(Toury 1995)。然而现实情境中翻译的受众并非教师,而是不具备专业知识的普通读者。因此,有必要强调译文质量评测中的多元视角,以打破目前评价主体的单一性(ibid.: 56)。现实中的普通读者大多不通晓源语,亦没有接受过翻译训练,对翻译质量的期待及阅读时的关注点可能会不同于业内人士,他们的评测方式可能会高度主观化和直觉化(Hansen 2009)。Suokas(2014)比较了普通读者和语

\* 本研究得到香港研究资助局“A Comparative Enquiry into Cognitive Processes of Translation and Paraphrasing—Evidence from eye-tracking and keylogging(Q76Z)”和东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资助,特此鸣谢。

言专家对同一份译作的评测结果,发现读者更关注译文的排版设计,而专家组更看重译语表达的质量。

## 1.2 翻译质量评测中的认知过程与眼动追踪

翻译的认知过程是近年来逐步兴起的热门研究领域。目前的认知翻译研究多以翻译的产出过程为研究对象,运用有声思维、键盘记录或眼动追踪等方法考察译者在翻译中的思维活动,但目标语读者在阅读翻译作品中的认知活动却时常被忽视(Jääskeläinen 2012)。Kruger 和 Kruger(2017)指出,翻译活动应涉及两种认知过程,一种是翻译的产出过程,也即目前翻译过程研究的重点;另一种是翻译作品的接受过程,这也是译文语义在译者和读者之间互动协调的过程。读者的语言文化背景可能会影响其阅读方式,塑造其对文本意义的构建与阐释。从翻译评测的角度来看,目标语读者作为评价主体如何在线加工译作,他们在译文评阅过程中的认知行为与评测结果有何关联,也应被纳入考察范畴,成为翻译过程研究的一部分。探究普通读者在译文在线评阅中的认知活动,有利于扩充现有的翻译过程研究视角,并了解真实受众对翻译的需求和期待。

读者研究的一大挑战是如何科学地测量读者对翻译的反应(Keen 2007)。有研究者通过调查或民族志研究法,考察了特定读者群对翻译作品的观点和评价,为此前基于主观经验的相关研究补充了实证数据(Chan 2015)。但这些研究手段难以揭示读者在接触译文时的认知心理活动。近年来,眼动追踪法已被广泛运用于翻译过程研究,是反映译者在线行为和思维活动的实时监测工具(Hvelplund 2014, 2017)。眼脑一致假说(eye-mind assumption)(Just & Carpenter 1980)表明,眼动轨迹能够反映语言加工中的认知负荷。通过观测译者的注视次数和注视时长等眼动指标,研究者可以分析翻译过程中的注意力分配和认知加工机制(O'Brien 2006, 2009; 冯佳 2017; 马星城 2017)。眼动技术在探索翻译产出过程中的成功应用表明,将其引入翻译质量评阅的过程研究大有可为:使用眼动观测评价者对翻译的阅读加工行为,分析其认知负荷,有助于从认知层面探索主体因素对语义构建和质量评测的影响。

## 2. 研究设计

### 2.1 研究问题

本研究以眼动追踪为主要数据收集手段,结合问卷调查和访谈法,尝试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眼动追踪如何反映读者在英译汉作品在线评阅中的认知活动?

(2)翻译质量中的主体因素是否会影响读者在阅

读加工译作时的认知负荷?作为专业读者的翻译教师和普通读者在实时评阅中将各自呈现出何种认知模式?

(3)读者的在线认知行为和对译作质量的评分是否存在关联?翻译教师和普通读者对翻译质量的理解和期待是否存在差异?

根据研究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几项假设:

(1)教师受试的在线总体认知负荷显著多于普通读者受试。在两类译文的评阅中,教师组的总注视时长和注视次数均多于读者组。

(2)受职业背景的影响,两组在原文和译文的注意力分配模式存在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教师组在加工原文中的认知负荷显著多于译文,读者组在加工译文中的认知负荷显著多于原文。

(3)职业教师对译文的平均评测分数低于普通读者组。受试在评阅中的总体认知负荷越多(包括注视时间和注视次数),译文的平均得分就越低。

(4)教师组对译文质量的关注重点以及翻译质量的期待不同于普通读者组。

### 2.2 受试

21名受试自愿参与了本实验,分为翻译教师组(T)和普通读者组(R)。所有受试均来自中国,普通话为母语,英语为第二语言。教师组包括9名在香港高校就职的翻译课教师(3男6女,平均年龄34.5岁),均具有5年以上翻译教学经验。普通读者组包括12名就读于香港某高校的学生(4男8女,平均年龄24岁)。这些学生均来自非外语或翻译专业,但拥有良好的英语读写能力。所有受试裸眼或矫正视力正常。

受试在实验前需填写一份语言和翻译背景调查问卷,提供年龄、二语初始习得年龄、教育背景,并在五点量表上(1:完全不熟悉/频率很低;5:非常熟悉/频率很高)分别标出自评二语熟练度、日常英文使用频率、对翻译评测的自评熟悉度。问卷结果表明,两组在英文熟练度和日常使用频率上无明显差异,但教师组对翻译质量评测标准的熟悉度明显高于读者组( $t=-11.26, p<.001$ ),前者的平均熟悉度为4.25( $SD=0.66$ )而后者的平均自评熟悉度只有1.2( $SD=0.44$ ),由此可判定这些普通读者对翻译的评测流程和标准基本无了解。

### 2.3 实验材料

本实验的原文和译文材料选自英语专业高年级翻译课程中的学生课后英译汉作业。根据Reiss对文本类型的区分以及翻译教学的实际情况,我们分别选用了一篇广告类文本作为材料A和一篇文学类文本作为材料B。两篇英语原文的长度相似(约200词)。A

为某品牌汽车宣传广告,B选自美国著名文学家爱默生的散文《论美》(“Beauty”)。教师在布置完翻译任务后,学生需在之后的一周内进行译前准备、文本翻译和译后修改润色,并将译文提交至课程网络平台供教师进行批改和反馈。我们收集了每篇原文对应的三篇学生译作,分别标号为A1、A2、A3和B1、B2、B3。这些译作的长度均在300字左右,无明显误译,信息完整,不包含语法错误,以便受试在阅读评测中更关注译文质量而不受无关因素的干扰。选用学生译作作为呈现材料,有助于了解专业和非专业读者群体对学生译作的加工模式和评价,检验其在译文评判上是否存在较大差异,以期为高校翻译教学的质量评测模式提供实证视角下的真实数据。

#### 2.4 实验设备

本实验采用 TobiiTX 300 遥测式桌面眼动仪采集受试阅读译作时的眼动数据。该眼动仪最高采样率为 300Hz,大约每 1-3 毫秒采集一次数据;受试在实验中无须佩戴其他设备,可保持自然坐姿和 37x17cm 范围内的头部活动,这从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实验的生态效度。本实验在隔音和室内光线恒定的房间进行,以减少外部环境对眼动记录的干扰;实验室布置同普通办公室类似,贴近真实工作环境。

#### 2.5 操作流程

所有受试均为单独施测。眼动记录开始前,受试将熟悉实验室环境和基本流程,阅读实验步骤和注意事项,并填写知情书。受试在实验中按日常习惯自由阅读屏幕上呈现的材料,实验对其线上阅读行为,例如原文译文的阅读次序或阅读重点并无指定要求,但受试在阅读完每份材料后,需立即对译文质量进行评测。

实验开始后,受试首先进行校准和热身,之后需依次阅读六份原材料,每份呈现材料分别包括原文和译文,原文置于电脑屏幕左侧,译文置于电脑屏幕右

侧。所有受试将先阅读广告类材料,在休息片刻后,再阅读文学类材料,每个类别下的三份材料以随机顺序呈现。实验无时间限制,受试在读完每份材料后,需在五点量表上为译文评分。在教学中,翻译质量评估往往涉及翻译错误的识别、统计和纠正(Pym 1993; Martínez & Albir 2001),但非专业读者不可能也无需遵循教学中的评测模式。Martínez 和 Albir(2001)指出,除了语言质量和忠实度等常规指标,普通读者眼中的译文可读性和信息传递效果可能更影响对翻译质量的判断。本实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考察读者在自然阅读中对译作的认知行为和态度,因此我们尽可能简化量表设计,受试只需按照读后的直观感受,基于对翻译质量的真实需求或期待评分。量表包括三项内容:(1)信息的准确忠实度;(2)译文的语言表达质量;(3)译文的交际效果。每项最高分为5分,最低分为1分,评测总分最高为15分;每项后附有简要说明,以便受试了解评判标准。在完成每类材料的阅读和评分后,受试将接受简短的访谈,对评测结果做简要解释。因眼动数据不够稳定,有三位受试的数据最终未被采用,因此最后的分析样本包括9名教师受试和9名普通读者受试。

### 3. 数据分析与讨论

我们将屏幕左侧的原文区视为兴趣区一,将右侧译文区作为兴趣区二,再利用 Tobii Studio 对兴趣区的认知投入以及注意力分配模式进行统计分析。本实验有效数据样本为18个,考虑到小样本中可能由于个体差异导致数据的非正态分布,我们先用 Shapiro-Wilk 检验每组数据的正态分布情况,如不符合正态分布,则改用非参数检验对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本部分选用总注视时长和注视次数反映受试的认知负荷。注视时间和注视次数是阅读和翻译类研究中被广泛采纳的眼动指标(Hvelplund 2014; Rayner 1998),它和任务加工难度密切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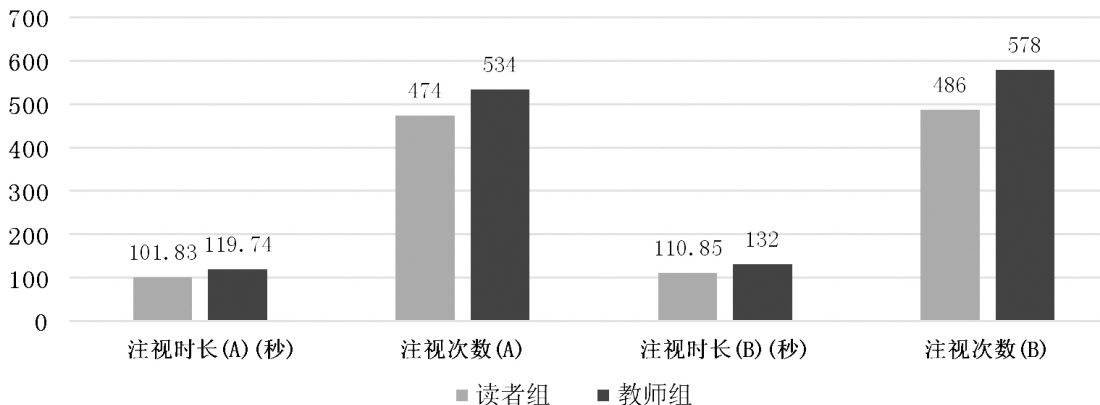


图 1:读者组和教师组在两类文本加工过程中的注视时长和注视次数均值

### 3.1 研究假设一

本假设认为:教师组的总体认知负荷显著多于读者组。为检验该假设,需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受试在每类文本中(包括原文兴趣区和译文兴趣区)

的注视次数和注视时长进行对比。Shapiro-Wilk 检验显示,受试数据均呈正态分布。t 检验显示,两组在广告类和文学类译文中的总认知负荷无明显差别(见表 1)。

表 1:读者组和教师组的注视时长和注视次数的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t 统计量	df 值	p 值
注视时长(A)(秒)	-0.812	16	0.429
注视次数(A)	-0.572	16	0.577
注视时长(B)(秒)	-0.933	16	0.365
注视次数(B)	-0.866	16	0.399

但图 1 显示,两组虽不具备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教师组在广告类译作和文学类译作的阅读评测中投入了更多的注视时长和注视次数,他们的平均认知负荷略高于普通读者。此外,两组在加工文学类译作中的注视时长和注视次数均值都略高于广告类文本的加工,说明受试在阅读评测文学类译作投入了稍多的精力。

由于两组差异未达到显著值,假设 1 无法完全成立。但考虑到样本容量偏小,这一结论基本符合预期和常识判断。根据 Reiss 的文本类型分类理论(2000),广告属于操作型文本(operative texts),为达到让消费者迅速获知产品信息并激发其购买意向的目的,该类文本的语言普遍较为简洁直白,其翻译更侧重交际效果。而散文作品属于表情型文本(expressive texts),注重语言形式,强调作品的感染力,对应的翻译也应还原这些特点,仿效忠实原作(Munday 2001: 74;张美芳 2013)。本研究发现,文本类型和对应的翻译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评阅者对译作的阅读加工策略:

文学类译作中较多的注视时长和注视次数说明,两组受试在评阅过程中倾向于更详细地比照原文和译文,并更仔细地阅读和揣摩译文中的遣词造句。受职业习惯影响,教师组的阅读更加深入,可能会更频繁地在线考察原文和译文的出入,以检验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风格和语言形式,因此投入了比普通读者更多的认知负荷。

### 3.2 研究假设二

本假设认为,受职业背景的影响,两组在原文和译文间的注意力分配模式存在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教师组在原文区的认知负荷总是多于译文区,而读者组在译文区的认知负荷总是多于原文区。我们将组别(教师组 vs 读者组)作为因素 1,兴趣区(原文 vs 译文)为因素 2,分别对受试在两类材料加工过程中的注视时长和注视次数进行 2x2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两组在两类文本中的各项指标描述统计数据见下表 2 和表 3:

对广告类文本注视时长的分析表明,组别对注

表 2:读者组和教师组在两类材料原文区(ST)和译文区(TT)注视时长的均值和标准差

	材料 A:注视时长(秒)(ST)		材料 A:注视时长(秒)(TT)		材料 B:注视时长(秒)(ST)		材料 B:注视时长(秒)(TT)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读者组	46.07	24.71	55.77	29	56.94	32.82	53.9	14
教师组	51.65	19.81	68	27.92	64.15	31.42	67.92	25.6

视时间并无显著效应( $F=0.572, df=1, p=0.471$ ),但兴趣区的主效应显著( $F=9.203, df=1, p=0.016$ ),组别和兴趣区之间无显著交互效应( $F=0.372, df=1, p=0.559$ )。对文学类文本注视时间的方差分析显示,组别对注视时间无显著效应( $F=2.933, df=1, p=0.125$ );兴趣区主效应不显著( $F=0.005, df=1, p=0.948$ ),此外组别和兴趣区之间交互效应不显著( $F=0.325, df=1, p=0.584$ )。表 2 显示,教师组在评阅两类材料中呈现出比较类似的文本区域间注意力分配模式:教师组受试在评阅广

告类译文时,在译文区停留的时长明显多于原文区,其显著差异也得到了方差检验的证实;在评阅文学类作品时,在译文区的平均停留时间也略高于原文区。读者组在两类材料中的注视时间分配则呈现出相反模式:在评阅广告译文时,译文区的注视时间明显长于原文区,并得到了方差检验显著性的支持;但在评阅文学译作时,原文区的平均注视时长要略高于译文区。此外,虽然组别效应的显著性未达到统计学意义,教师组在原文区和译文区的注视时长均多

表 3:读者组和教师组在两类材料原文区(ST)和译文区(TT)注视次数的均值和标准差

	材料 A:注视次数(ST)		材料 A:注视次数(TT)		材料 B:注视次数(ST)		材料 B:注视次数(TT)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读者组	208	123.55	265	152.48	247	151.32	239	76.5
教师组	231	66.03	303	118.84	294	145	284	100.92

于读者组。

对广告类译作注视次数的方差分析表明,受试在评测此类译文时,组别主效应不显著( $F=.263, df=1, p=.622$ ),但兴趣区对注视次数的主效应较为显著( $F=11.008, df=1, p=.011$ )。此外,并没有发现组别和兴趣区的交互效应( $F=.732, df=1, p=.732$ )。对文学类译作的注视次数分析表明,没有发现组别的显著主效应( $F=2.878, df=1, p=.128$ )和兴趣区显著主效应( $F=.140, df=1, p=.718$ ),同时两项因素间也没有明显交互作用( $F=0.002, df=1, p=.970$ )。表 3 显示,在广告类材料加工中,两组受试在译文区的注视次数均明显多于原文区,并得到了方差检验结果的支持;虽然文学类译作的评阅中兴趣区主效应未达到显著值,两组受试在原文区的注视次数均值要高于译文区。此外,教师组对两类译作原文和译文的注视次数均值总是高于读者组。

两组在不同兴趣区间的注意力分配趋势大体一致,如在广告材料译文的认知负荷均显著多于原文,而在评阅文学译作时,呈现出不同的精力分配趋势:读者组在原文的平均认知负荷要多于译文,这可能是由于读者并不熟悉文学作品的表达方式,需更多时间理解原文;教师组在原文的注视时长少于译文,但对原文的注视次数却比译文多,这可能是因为教师组更注重文本的对比分析,在审阅译文的同时也会频繁关注原文,以考察译文是否做到了忠实对应。

Hvelplund(2014)曾指出,通过注视点分布图和热区图的形式将眼动数据可视化,有助于直观了解翻译评阅中的注意力分配模式。我们从眼动数据最为稳定的一批结果中,选取了两位读者(R2 和 R8)和两位教师(T6 和 T8)分别在评阅广告类译作(A2)和文学类译作(B1)时的热区图。图片中颜色偏红的区域代表受试对该区域更密集的加工注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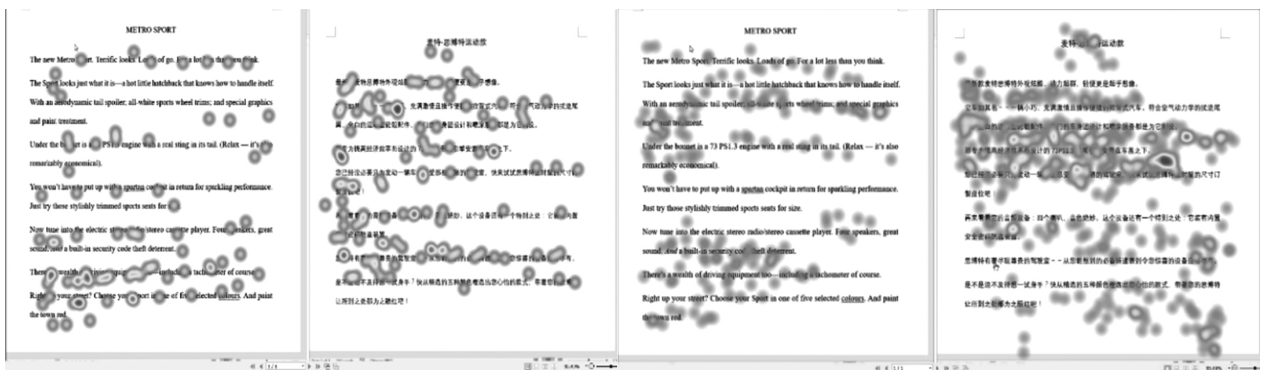


图 2:R2 和 T6 在评阅广告类译作时的注视热区图对比(左侧:R2,右侧:T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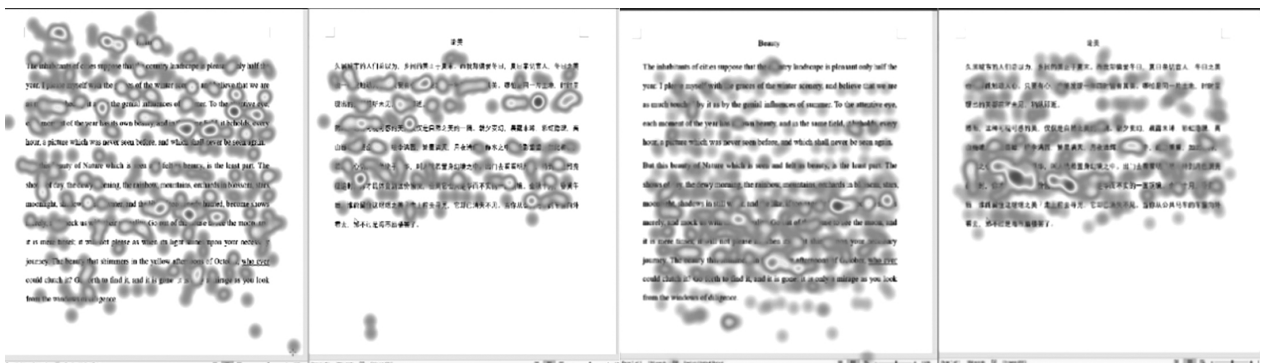


图 3:R8 和 T8 在评阅文学类译作时的注视热区图对比(左侧:R8,右侧:T8)

从热区图可看出,在评阅广告类译作时,R2和T6均在译文区投入了更多的注意力,译文部分的热区覆盖范围更大,颜色更深。和T6相比,R2在原文区的红色注视焦点更多,这可能是由于广告原文中包含部分产品专业术语,受语言和职业经验限制,读者受试不得不在这些部分多做停留以更好地理解原文。此外,对比译文部分的热区图可发现,T6的译文区域较多面积被颜色覆盖,特别是译文的上半部分几乎全部处于注意力集中区域。这说明该受试对原文和译文都进行了较为密集的加工,这种加工并非仅局限于部分词句,而是针对全段的逐字深度阅读。相比之下,R2的热点区域则较为分散,多限于个别词句,各热区多为孤立出现,其阅读加工不如教师受试全面细致,不少部分可能被跳读。这意味着该读者在阅读广告译文时,更侧重全文大意或重点信息。在评阅文学类作品时,R8和T8的两个兴趣区均被较深颜色覆盖,说明在审阅文学译作时,对原文和译文都进行了较为密集的加工。但仔细对比可发现,R8受试在原文的注视热点(包括红色焦点区域)要明显多于译文,这可能是普通读者对文学类作品的特定语言表达还不够熟悉,在理解原文或比照阅读中需花费更多精力。相比之下,T8在两个区域的精力分配较为平均,精力集中区域(红色区域)落在原文和译文偏后位置,说明T8可能就某一处的翻译

对原文中该区域和对应的译文区域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比照分析。

### 3.3 研究假设三

教师对各篇译文的评测分数均低于普通读者组,受试在评阅中的认知负荷越多(包括注视时间和注视次数),译文平均得分就越低。为检验该假设,我们先对两类译作的总评分(满分15分)进行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两组受试在广告类的总评分上,存在显著差异( $t=3.145, df=13.971, p=.007<0.05$ ),教师组的评分明显低于读者组。在对文学类译作的评测中,教师组的平均评分仍低于读者组,但两组评分差异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 $t=1.39, df=16, p=.184$ )。两组受试的总分均值详见图4。该图显示,教师组对各篇译作的平均评分都低于读者组,这可能是由于教师更熟悉翻译质量评测的流程和标准。前文数据分析显示,教师组在译作评阅中的注视时长和注视次数更多,审阅更加细致,也可能识别出较多的翻译不当,因此降低了评分。

根据3.1的数据分析,教师受试在两类译文中的注视时长和注视次数均高于读者受试,说明教师组投入了更多认知精力,或者说,受职业和经验影响,教师受试对译文中的问题或不当之处更加敏感。从两组受试的评分情况来看,受试在评阅中的过程数据和翻译产品的评阅结果基本趋势是相同的。因此本假设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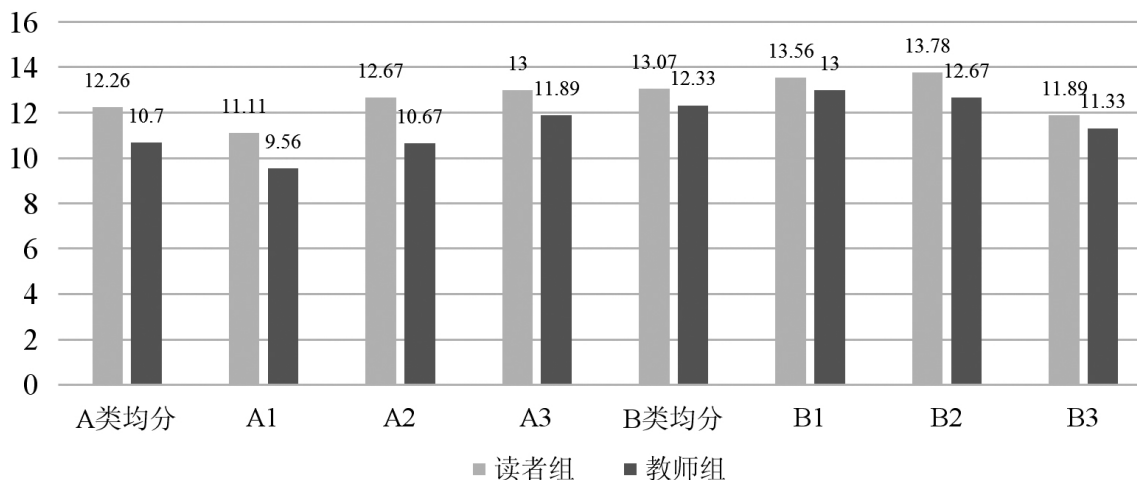


图4:读者组和教师组对两类译作的评分均值统计

到了数据支持。

### 3.4 研究假设四

本假设认为教师组对译文的关注重点以及翻译质量的期待不同于普通读者组。我们将受试的访谈录音整理并转写成文字,初步分析显示两组对译文的主观评价存在以下几项特征:

(1)普通读者组对翻译的评价高度个性化,更多受直觉驱动,并无明确标准。教师受试对译文的评价虽不完全趋同,但均或多或少提及“翻译策略”,说明翻译策略的运用是否适当是教师组的重要评测标准之一。具体表现包括:读者组内部出现了对同一篇译作截然不同的看法,以对A1的阅后访谈为例,R1认

为译文“好像添加了很多,有些地方没有对应,不是完全忠实”;但 R5 则强调译文“每句应该都找到了对应,比较准确”。由于读者受试的背景差异,且没有受过任何翻译训练,他们对译文忠实度的看法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在对译文的评价中,有 4 名教师强调了归化和异化问题,体现了对翻译策略导向的重视。此外,没有发现教师组内出现对同一篇译文某项指标截然相反的评判观点。

(2)就总体态度而言,读者组的评价更积极,教师组的评价相对较批判。此类差异在两组对文学译作的语言质量评价上最为明显。以 B2 为例,译者将原

文标题“Beauty”译为“得美于心,寓美于外”,并在译文中运用大量成语或四字格表达,例如:

原文节选:Go out of the house to see the moon, and it is mere tinsel; it will not please as when its light shines upon your necessary journey. The beauty that shimmers in the yellow afternoons of October, who ever could clutch it?

译文:“出门望月,只觉俗丽,远不及旅途共婵娟。十月黄昏,流光溢影,顷刻之美,孰能留于指隙?”

我们整理出了 4 位读者和 4 位教师在访谈中对 B2 语言表达的评价,详见表 4。

表 4:两组受试对文学类译作 B2 语言质量的评价

读者受试	教师受试
R2:语言诗意,用词蛮美的,较古典,很有文学感。	T1:原文句子其实是比较简短的,风格也相对朴实……译者可能是想发挥中文语言特点,采取了归化策略……这样就不够准确了。
R7:长短句搭配合理,平仄错落,读起来很顺畅,语言也非常好。	T3:文学翻译应避免过度归化,应尊重原文语言风格……标题太华丽了,其实原标题没有这个含义。
R8:译文比原文更好……标题翻译得很美,把美感传达出来了……语言富有诗意,感觉很舒服。	T4:译者用了一些古文的风格,但还不如用现代文……刻意追求古典风格和整齐句,风格和原文偏差有点大,因为原文表达并不是华丽的。
R9:翻译得很优美,意思比较准确。	T6:语言有点华而不实,四字格拼凑有些牵强。

表 4 显示,两组对文学译作的语言处理方式存在较大分歧,教师组普遍能感觉到译文在语言风格上的偏离,并从翻译策略的角度对译文的过度美化持批判态度。但读者受试普遍认为 B2 语言优美,表达流畅。值得一提的是,在对文学译作 B3 进行评判时,不少读者受试强调其语言不够优美,“读起来不像文学作品”。3.3 中两组的评分结果显示,受试对翻译质量的不同要求影响了评分,读者组和教师组中平均得分最高的译文并不一致。

(3)教师比读者更关注译文的忠实和准确,这种忠实不仅包括信息的完整也包括语言风格的忠实;而大多读者受试对译文中的添加、删减或“过度发挥”相对宽容甚至持赞赏态度,认为这有助于增强表达效果。以 R9 为例,该受试给文学类的三篇译文均打了满分,她认为虽然“能感觉到部分地方没有很好地对应,译文似乎添加了一些东西”,但这样反而能“更好地传递美感”。以上分析表明,两组对翻译质量的看法存在不少差异,因此假设 4 是成立的。

#### 4. 讨论

4.1 翻译质量评价中的主体因素:普通读者对译作的加工和评判

翻译质量并非一个孤立绝对的概念,对质量的评判不仅涉及译文本身,也应考虑读者因素的影响。本

文以眼动跟踪为主要数据收集手段,考察了专业教师和普通读者对不同类型文本译文的在线评阅过程,发现非专业读者呈现出和教师不一样的在线加工特征,对译作的评判和解读也不同于专业教师。

读者因素是翻译质量研究乃至翻译研究中被忽视的部分。Chesterman(1998: 226)指出,大多关于读者的探讨建立在学者自身的经验甚至假想之上,而研究中提及的读者也往往被理想化和抽象化了。Chan(2015)呼吁应关注真实情境下不同类型的读者,加强对真实读者反应的考察。

本研究发现,普通读者在评阅中的认知负荷普遍少于专业教师,在原文和译文间的精力分配模式不同于教师组。读者组对译文的评价也更积极宽容,两组在对文学译作的评价中展现较多差异。研究表明,教学界和普通读者群体对翻译可能持有不同的期待规范。根据 Chesterman(1997)对翻译规范的分类,期待规范指的是目标语读者对译作的期望:翻译作品应具备哪些特质?译作应呈现出何种语言风格?期待规范左右着大众对翻译质量的判断,并决定着译作的接受和评价问题(李德超,邓静 2004)。虽然样本容量较小,但读者受试对文学译作中语言美感以及对广告译文中交际效果的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读者对翻译质量的主流期

待。当读者的期待规范与教学中广为接受的期待或评判依据出现较大偏差时,教师应坚持固有的质量评测手段还是兼顾读者的想法,对现有的评价体系进行调整?读者对翻译作品语言优美或所谓“信达雅”的追求是否合理?塑造读者期待规范的因素有哪些?翻译专业学生在练习和实践中是否要迎合或抗拒读者的某些期待规范?这些问题需要更多实证数据的支持。

#### 4.2 认知视角下的读者反应描写研究

Toury 的描写翻译理论打破了以源语或译者为传统的中心研究模式,立足目标语体系,描写各种真实存在的翻译现象和翻译活动。事实上,任何翻译作品或操作的发生空间都是目标语系统(王运鸿 2013),决定翻译作品可接受度的并非研究者或译者,而是目标语文化或目标语读者。在此背景下,应将读者纳入描写翻译研究体系中,既描述其对翻译的观点和态度,也应描述其在译作接收过程中的思维活动,考察读者的认知加工与译文质量或可接受度之间的关联。Walker(2018)尝试用眼动追踪技术,比较了源语读者和目标语读者在阅读加工原文和译文时的在线反应,从认识视角探讨了翻译传播中的对等概念。翻译的描写研究应加大对读者在线认知过程的考察。

翻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考察目标语读者对中国文学名著译作的在线反应过程,并探索其和译文接受度之间的关联,或许能为解答中国文学译介中的忠实原文或连改带译、归化还是异化、文化负载词的处理等常见议题提供新思路。本研究证明,眼动跟踪技术不仅可用于探索翻译生成过程中的认知活动,也可用于探索读者在加工翻译作品时的“黑匣子”。

#### 4.3 过程导向研究与产品导向研究

Holmes(2004)在其译学构想中将描写翻译学研究分为三大分支:产品导向研究(product-oriented)、过程导向研究(process-oriented)和功能导向研究(function-oriented)。近年来,以译员认知活动为核心的翻译过程研究发展迅速,研究者开始借助神经科学、心理语言学等领域的理论或工具,对翻译中的语言表征与加工、思维活动和决策等进行测量和分析(Muñoz Martín 2010; Timarova 2010)。然而,这些研究大多遵循认知科学领域的研究路径,把翻译视为一种特殊的双语转换现象,以检验语言加工领域的某些理论假设,因此和其他分支的描写翻译研究关联还不够紧密。长期以来,过程导向研究和产品导向研究被视作泾渭分明的两个领域,有着不同的研究关切和研究路径,一方的研究成果也难

以被另一方吸取利用。但这种二元对立式的看法并不利于翻译研究的长足发展(Halverson 2015)。就本文探讨的译文评测而言,读者对翻译产品的评判难免会受到其背景和经历的影响,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其思维决策过程,并以特定的行为方式(如眼动特征)展现出来。运用过程研究中的研究范式和数据收集工具去探索翻译产品在目标受众中的加工过程,或许有助于打破它与不同研究分支之间的壁垒,促进翻译研究多种路径间的互通。

### 5. 结语

本研究利用眼动追踪技术考察了翻译教师和普通读者在评阅不同类型翻译文本时的认知负荷和阅读模式,并结合评测分数和读后访谈,分析了主体因素对翻译质量评测的影响。现行的翻译教学体系中,学生甚少有机会接触到普通读者对其译作的回馈或评判,了解普通读者如何检视并评价学生译作,可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目标读者群对翻译质量的解读和期待,而读者的“声音”也是对目前翻译质量评价体系的有益补充。考虑到样本容量的限制,本研究仅是一个初步的探索性研究,后续研究需纳入更多的文本类型,招募大量多元背景的读者参与,以进一步探索主体性因素对译作评阅过程和质量评测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冯佳. 2017. 译入/译出认知负荷比较研究[J]. 中国外语(4): 79-91.  
李德超, 邓静. 2004. 传统翻译观念的逾越: 彻斯特曼的翻译规范论[J]. 外国语(4): 68-75.  
马星城. 2017. 情境认知视角下的翻译过程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6): 939-949.  
王运鸿. 2013. 描写翻译研究及其后[J]. 中国翻译(3): 5-14.  
武光军. 2007. 当代中西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的进展、元评估及发展方向[J]. 外语研究(4): 73-79.  
张美芳. 2013. 文本类型、翻译目的及翻译策略[J]. 上海翻译(4): 5-10.  
Chan, Tak-hung L. 2015. Reader-response and reception theory[C]// C. V. Angelelli & B. Baer. *Resear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Abingdon: Taylor and Francis: 146-154.  
Chesterman, A. 1997. *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Chesterman, A. 1998. Causes, translations, effects[J]. *Target* 10: 201-230.  
Colina, S. 2008. Translation quality evalu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or a functionalist approach[J]. *The Translator* 14: 97-134.  
D'Hulst, J. 1997. Focus on the target text—towards a functional model for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C]//K. Klauy & J. Kohn. *Transfere Necesses est*. Budapest: Scholastica: 102-107.  
Fish, S. E. 1970. Literature in the reader: affective stylistics[J]. *New*



*Literary History* 2: 123–162.

- Halverson, S. 2015. 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he merging of empirical paradigms: the case of “literal translation”[J]. *Translation Spaces* 4: 313–343.
- Hansen, G. 2009. Some thoughts about the evaluation of translation products in empirical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J]. *Copenhagen Studies in Language* 38: 389–402.
- Hatim, B. & I. Mason. 1997. *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Holmes, J. S. 2004.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C]// L. Venuti.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2<sup>nd</sup>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80–192.
- House, J. 1997.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A Model Revisited* [M]. Tübingen: Narr.
- House, J. 2014.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past and present [C]// J. House. *Translation: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41–264.
- House, J. 2015. *Translation as Communication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M]. Abingdon: Routledge.
- Hvelplund, K. T. 2014. Eye tracking and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reflections on th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eye-tracking data [J]. *Mon TI. Monografías de Traducción e Interpretación*: 201–223.
- Hvelplund, K. T. 2017. Eye tracking in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C]//J. Schwieter & A. Ferreir. *Th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556–572.
- Jääskeläinen, R. 2012. Translation psychology [C]. Y. Gambier & L. van Doorslaer.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Volume 3*.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1–197.
- Just, M. A. & P. A. Carpenter. 1980. A theory of reading: from eye fixations to comprehension [J]. *Psychological Review* 87: 329–354.
- Keen, S. 2007. *Empathy and the Novel*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ruger, H. & J. L. Kruger. 2017. Cognition and reception [C]//J. W. Schwieter & A. Ferreir. *Th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72–89.
- Lauscher, S. 2000.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where can theory and practice meet? [J]. *The Translator* 6: 149–168.
- Martínez, N. & A. H. Albir. 2001. Assessment in translation studies: research needs [J]. *Meta* 46: 272–287.
- Munday J. 2001.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Muñoz Martín, R. 2010. On paradigms and cognitive translology [C]// G. Shreve & E. Angelone.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69–187.
- Nord, C. 1993. *Einführung in das Funktionale Übersetzen: Am Beispiel von Titeln und Überschriften* [M]. Tübingen/Basel: UTB für Wissenschaft.
- O’Brien, S. 2006. Eye-tracking and translation memory matches [J]. *Perspectives* 14: 185–203.
- O’Brien, S. 2009. Eye tracking in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J]. *Methodology,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38: 251–266.
- Orlando, M. 2011. Evaluation of translations in the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at the crossroads between theoretical, professional and pedagogical practices [J].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5: 293–308.
- Paulina, A. & P. Pollastri 2008.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ranslation quality [J]. *CIUTI Forum*: 239–260.
- Pym, A. 1993.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in Translation and Its Teaching* [M]. Calaceite: Ediciones Caminade.
- Rayner, K. 1998. Eye movements in reading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5: 372–422.
- Reiß, K. 1971. *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der Übersetzungskritik. Kategorien und Kriterien Für ein sachgerechte Beurteilung von Übersetzungen* [M]. München: Max Hueber Verlag.
- Reiss, K. 2000. Type, kind and individuality of text: decision-making in translation [C]//L. Venuti.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60–171.
- Reiss, K. 2004. *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Potentials & Limitation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and Educational Press.
- Rosa, A. 2006. Does translation have a say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ntemporary linguacultures? Some figures on translation in Portugal [J]. *Polifonia* 9: 77–93.
- Schäffner, C. 1998. *Translation and Quality*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Suokas, J. 2014. “Nothing freeze-dried.” *Testing Usability Evaluation Methods with the Finnish Translation of Te Guitar Handbook* [D]. Finland: University of Eastern Finland.
- Timarova, S. 2010. Interpreting process research: paradigm and methods [C]//I. Mees. *New Approaches in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Copenhagen: Samfundslitteratur: 133–150.
- Toury, G.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Walker, C. 2018. Towards a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equivalent effect and a tentative conceptualization of cognitive equivalence [C]//C. Walker & F. M. Federici. *Eye Tracking and Multidisciplinary Studies on Transl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25–258.

收稿时间: 2020-01-08

作者简介: 马星城, 博士, 讲师。研究方向: 口笔译认知过程。李德超, 博士, 副教授。研究领域: 翻译理论与实践。

(责任编辑: 李德俊)